

Aalborg Universitet



Li, Xing

Published in:
Guoji Guanxi Xueyuan Xuebao

Publication date:
2010

Document Version
Accepted author manuscript, peer reviewed version

[Link to publication from Aalborg University](#)

Citation for published version (APA):
Li, X. (2010). . *Guoji Guanxi Xueyuan Xuebao*, 5, 1-7.

General rights

Copyright and moral rights for the publications made accessible in the public portal are retained by the authors and/or other copyright owners and it is a condition of accessing publications that users recognise and abide by the legal requirements associated with these rights.

- Users may download and print one copy of any publication from the public portal for the purpose of private study or research.
- You may not further distribute the material or use it for any profit-making activity or commercial gain
- You may freely distribute the URL identifying the publication in the public portal -

Take down policy

If you believe that this document breaches copyright please contact us at vbn@aub.aau.dk providing details, and we will remove access to the work immediately and investigate your claim.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扩展版来源期刊

全国社科学报优秀栏目

全国优秀社科学报

JOURNAL OF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國際關係學院

學報

GUOJI GUANXI XUEYUAN XUEBAO

2010.5

理解当代资本主义柔性和社会主义局限性的 葛兰西方法

李 彤

(奥尔堡大学 发展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 丹麦 奥尔堡 9200DK)

〔摘要〕葛兰西的“主导性理论”对传统马克思主义进行了修正和补充,对政治理论的一系列关系概念作出了新的解读,如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阶级利益和意识形态,政治社会和公民社会,支配型统治和主导型统治,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错误意识和积极认同等。葛兰西的“主导性理论”尤其适用于分析和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柔性和当代社会主义社会的局限性。

〔关键词〕葛兰西;主导性;阶级;意识形态;统治;认同

〔中图分类号〕D0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489(2010)05-0001-07

一、导言

人们普遍认识到,思想和意识形态对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发展和变革具有重要作用。有人认为,导致现代社会主义瓦解的一个强有力因素就是,为了约束大量多样化的社会因素而导致其主体意识形态的衰败。然而,尽管当代社会主义遇到明显挫折,很多人(包括我在内)仍然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作一个分析社会发展和演变进程的重要视角。努力振兴马克思主义是基于这样的信念,即虽然资本主义在维持经济增长和繁荣方面取得了成效,但是资本主义的增长和繁荣不是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而是在剥削、不平等、异化、商品化和损害自然的基

础上。因此,我们需要弄清的关键问题是资本主义体系是如何成为主导的,而且为何有这么多人参与这一似乎在很多方面违背人类最佳利益的制度,并不断的建构和支持它。在这方面,葛兰西的理论贡献在于运用一个批判性的马克思主义框架来看待社会政治的发展,其理论中许多概念尤其适用于分析和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柔性和革命后社会主义社会的局限性。

二、葛兰西政治理论的要点

(一) 主导性理论

葛兰西的“主导性理论”(theory of hegemony)^①包含了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因素,如权力,阶级斗争

① 英文“Hegemony”一词在中文词典的普遍翻译是“霸权”。笔者在中文的文献中看到的大多是“霸权”。虽然 Hegemony 在一定意义上也有霸权的含义,但霸权一词不确切因为它带有贬义的色彩。而葛兰西的“hegemony”指的是统治阶级或一种社会体制能保持领导地位和在国家各领域保持主导权的能力。这种能力包含了一定超越阶级和意识形态的普遍性价值观,也包含了统治阶级弹性和伸缩力以及不断妥协、更新和自身不断完善的素质。因此,“hegemony”应翻译为“主导”,“主导性”,“主导权”。

和利益,国家的国民,公民社会,物质基础,民主等等。这个理论建构了一个深刻的、有关国家与社会、政治与意识形态辩证关系的概念性框架。葛兰西主导性理论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资产阶级能保持主导权的现象提供了富有洞察力的分析,对工人阶级所需要的在国家权力中优先树立自己主导权和掌握主导权的条件提供了有价值的思想。尽管葛兰西没有对后革命社会的社会主义坎坷历程提出一个理论上的解释,但是笔者认为葛兰西的理论思想,尤其是他的主导权概念,对于理解现代社会主义瓦解背后的危机因素仍具有重要价值。

葛兰西理论的出发点是“主导性”概念,也就是统治阶级通过强制和认同相结合的方式对被统治阶级实施统治。“主导性”概念的目标在于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主义框架的局限性找到一些答案。传统马克思主义断言,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现存的生产关系再不能容纳它们的进一步发展,那么社会革命将是不可抗拒的,旧的体系就要崩溃。主导权理论努力拓宽分析的视角并通过观察其他因素力图解释马克思主义的论断没有实现的原因:“在社会和政治上层建筑中存在一种强有力的稳固机制,它有助于在有限生产上稳定一个阶级的主导地位,并与该机制的连续性相协调”。^[1](P.219-250)

按照葛兰西的理解,主导(结合强制和认同并存的统治艺术)是一个意识形态概念。马克思主义将意识形态定义为“巩固一个特定经济秩序的社会功能”,^[1](P.219-250)而列宁把它与革命的策略联系起来:工人阶级和他们的支持者应该采用的,以赢得大多数人支持的一种策略。^[2](P.22)葛兰西将主导权从一个革命性策略转变为一个概念,在这个概念里,它增加了一个新的因素,包括统治阶级在获取和维持国家权力时的实践。统治阶级,葛兰西称之为主导阶级,是“通过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来创立和维持一个联盟体系,并获取其他阶级和社会力量认同的阶级”。^[2](P.22-23)

传统马克思主义主导性概念认为统治阶级在意识形态对被统治阶级灌输了“错误意识”(false consciousness)。^①基于这一观点和解释,当代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能够与被统治阶级形成共识以维持统治的原因,是因为资产阶级进行了无休止的“教化”的过程,并且享有“意识形态特权”。但是,葛兰西的理解要比“错误意识”或“意识形态优势”更加复杂。

葛兰西想要指出的问题是意识形态的领导(主导性)不能被简化为一种强迫的“合法性”,“错误意识”或者“操纵”等。对统治阶级主导权的意识形态来说重要的是“提供一个更具凝聚力、更系统的世界观,这个世界观不仅影响大众,而且充当了社会制度的组织原则”。^[3](P.201)资产阶级的占优势的意识形态,包括来自被统治阶级的积极认同,而不是消极屈服,不是强迫的;相反,是通过不平等力量在一个复杂过程中的“协商”,通过这一过程,工人阶级的服从和反抗得以发挥和重塑。^[2](P.64)

(二) 主导性的物质基础

主导性概念可以理解为一个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参与的过程: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在社会、政治和经济再生产的不断交换中,使用心理的和物质的报酬。这清楚地表明葛兰西的一个关键的理论假定,即“主导性建立和维持的物质基础”。如同马克思一样,葛兰西认为经济结构是任何阶级获取统治地位的首要因素。然而,对他来说,主导性也意味着“思想和道德的领导”,这种领导可以被理解为“生产关系中的经济妥协,这种妥协在政治和意识形态层面是公开认可的,也是尽力去实现的”。^[4](P.125-134)

葛兰西的主导性理论的重要部分在于以下这个论点,即思想和道德领导是不能单凭意识形态教化来实现和维持的,为了建立意识形态主导权,统治阶级必须为被统治阶级提供物质条件。对葛兰西来说,意识形态并不是“似乎漂浮于高空、凌驾于政治和人类其他实践活动之上的东西”^[2](P.58),相反,在人们

① “错误意识”是指资产阶级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宣传和误导。它混乱人们辨别是非的能力,而且错误地认可或接受资产阶级的说教,比如人权、民主、自由、平等等等。

的实践中,它有一个物质的存在。说意识形态有一个物质的存在是指意识形态的形成来自于人们的现实生活实践,以及在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组织中的具体实践,如政党、工会、工业和金融机构等等。通过个人的实践以及在各种制度和组织中的这些实践的影响,意识形态得以形成、维持和扩展。从这个角度看,葛兰西的理论是发人深思的,因为它通过揭示上层建筑和物质基础的互相影响机制,建立了主导性概念。正像葛兰西指出的,“尽管主导性是伦理的、政治的,但它也必须是经济的,必须以处于经济活动核心的领导集团和它决定性功能的发挥为基础。”^{[5] (P.161)}换句话说,生活水准和福利也能被看作是主导性的物质性基础的一个内在部分。

根据葛兰西的观点,一个阶级或一个社会集团的主导性须具备两个密切相关的方面:支配型统治和主导型统治。支配型统治意味着某种形式的强迫性统治,而主导型统治指的是建立在一定认同或消极认同的基础上。葛兰西强调主导权概念隐含着一个基本的含义,即为了维持其统治地位,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倾向于使用“以认同来统治”,而不是“以暴力来统治”。以认同来统治就是意味着代表全社会的普遍利益,不仅是在政治上、经济上,而且是文化上和意识形态上。“以认同来统治”最重要指的是资产阶级不但理解而且尽力实现被统治阶级的利益使所谓的“错误意识”在现实中成立和被接受。

从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观点来看,在资本主义社会统治阶级要保持自己的核心利益,同时又要满足被统治阶级的基本利益以便确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所有制的不变,要保持这种利益平衡是很困难的。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即资产的暴利相对工人阶级的工薪水平,往往会打破社会的平衡。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现代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的资产阶级已经意识到为了维持自身主导权和利益,在不放弃生产模式和其根本阶级利益的情况下回报被统治阶级的物质要求,是十分必要的。换句话说,资产阶级能够维持根本的,但往往不稳定的平衡:一方面,为资本积累和再生产赚取足够多的利润,另一

方面,为大众实现物质福利,以便他们接受资本的统治。

(三) 主导性的上层建筑

尽管利益平衡和物质因素很重要,但并不足以巩固统治阶级的主导权。为了获得一个真正的主导权,统治阶级必须能够“超越纯粹经济阶级的团体界限”,^{[5] (P.181)} 并成为能够将自身利益与被统治阶级的利益联系在一起的全体阶级。也就是说,把经济统治与上层建筑领域里的优越性相结合,如文化、宗教、政治、教育和社会制度,这样一个真正的主导性政权因此得以巩固。因此,一个真正的主导性意味着来自上层和下层的阶级妥协,这会引起普遍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认同。要使上层建筑发挥作用以产生普遍共识,资产阶级民主(资本主义民主)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普世公认,国家是代表了一个社会或一个团体的“普遍利益”。传统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倾向于认为权力集中于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就是夺取国家政权。尽管像马克思和列宁一样,葛兰西承认资产阶级统治的意识形态或认同性也存在于国家之中,但是他将国家的定义扩大为强制加认同。^{[5] (P.263)} 在这种国家概念里,“政治社会”(国家)是强制统治的机器,而“公民社会”是提供认同的主要力量。换句话说,国家就是政治社会和公民社会之间的平衡。

因为资产阶级主导性认同在公民社会牢固地确立,资产阶级通常不必亲自掌管国家行政大权,只要是国家统治者认识到公民社会为主导的社会结构作为他们政治行为的基本限制。^{[6] (P.51)} 正是在政治和公民社会的层面上,真正全面的主导观念得以最终维持和巩固。

葛兰西主导权理论最具影响力的部分是这样的观点:大众认同必须成为政治制度建立过程中的主要部分,而不是这些制度先建立后再如何被认同所合法化。^{[7] (P.38-39)} 这个理论的含意在于解释这样一个事实,即资产阶级主导性背后的真正力量在于社会冲突出现在公共议程之前,对其进行控制的能力:对敌对政党之间冲突范围的约束,凭借他们规划思路和设想可供选择办法的能力来致力于寻找解决方

三、葛兰西的主导性思想和社会主义局限性

葛兰西主导权概念的核心贡献在于揭示了统治阶级在说服其它阶级或社会集团接受它的道德、政治和文化价值方面取得成功的机制。^[9] (P.11) 通过主导概念,他指出获取和维持基于多数认同的领导地位的困难。在批评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和斯大林时代的局限性时,他认为社会主义不能建立在没有民主、没有大众参与政治进程的基础之上。^[10] (P.20) 根据这个观点,政治不能简化到只局限在执政党和政治社会,而必须包括社会的所有层面和领域。而且,它应该被看作是“一个不断应对新的挑战的过程和不能被局限于固定的制度形式的过程”。^[11]

(一) 革命后政权的维护和代表性

无产阶级为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政治斗争不应该局限于夺取国家政权,而且还应该扩展到赢得整个公民社会。对葛兰西来说,国家政权不应只代表统治阶级的特定利益和工具而发挥作用。正像萨苏恩认为的那样,国家可以被看作是产生和调节阶级妥协的工具,而阶级妥协对资产阶级主导性来说是必不可少的。^[4] (P.134) 从当代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来看,其主要问题在于夺取国家政权后的主导权的维护。正像葛兰西所强调的,即使一个社会阶级或集团占据统治地位和取得政权以后,它也必须继续“领导”。主导性不能被想当然,而必须不间断地维护。这需要领导阶级在公民社会的所有领域维护和加强自己的社会权威,进一步做出必要的妥协以使现存的各种联盟体系适应正在变化的条件。^[2] (P.37) 换句话说,一旦一个阶级或社会集团夺取了国家政权和取得了主导权,那么它的政权和统治赖以建立的体系就要不断地进行调整和重新协商,这个体系包括意识形态领域的“联合阵线”(历史集团 historical bloc),物质基础和公民社会。

当代社会主义挫折的一些教训可以从葛兰西理论得以解读,即参考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作为融合

主导权和统治的体系的资产阶级民主的相关手段。伴随着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通过摧毁资产阶级统治——国家的高压权力,成功夺取了政权。但是,它没有获得完整的主导权,一个完整的主导权是必须不断建设的。在夺取国家政权和处在领导地位以后,无产阶级必须继续为了主导权而斗争,正确处理新社会各种因素的相互关系。这样一个策略甚至早在处在领导地位以前就应该做好准备。在这方面,我们看到葛兰西优先考虑是如何继续在政党、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有机关系方面进行不断的政治变革,也就是,继续为领导和代表全体国民的利益和认同而努力。

(二) “新社会”和“旧社会”的关系

尽管社会主义事业的目标在于打破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传统的划分,但是革命后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旧的社会关系的不可能根除。对葛兰西来说,虽然社会主义事业的目标是要铲除传统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这样一个目标既是理想主义的又是可能的,但也可能永远无法实现。这是因为,尽管思想、实践和制度可能改变,但是它们深深扎根于文化和传统之中。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传统的官僚政治关系,即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这些都仍然会在革命胜利后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再生。换句话说,官僚政治不仅是资本主义的一个问题,而且也是社会主义的一个严重问题。这正是葛兰西不期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社会关系”方面产生脱胎换骨的不同的原因。革命前资本主义社会所遇到的问题在革命后的社会主义社会同样也要遇到。

所以,根据葛兰西的观点,无产阶级在旧社会的废墟上牢牢建立自身主导权的方法就是继续加强大众认同。葛兰西所理解的大众认同既是消极的也是积极的。就消极认同而言,它只是被看成是国家的工具,群众则被视为是“用来发动运动的群体”,而就积极认同而言,它是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的真正的互动。^[12] (P.118) 积极的认同也是包容性的认同。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能看到葛兰西从斯大林的“自上而下的革命”中,意识到了它包容性的丧失。这种政治往往等同于纯粹的国家主义和统治工具(官僚政治的

中央集权制,专制的家长作风,各种各样的专制政治和极权主义,集团利益,等等)。^{[12] (P.119)}所以,葛兰西认为斯大林式的主导性是以消极认同为基础,一个真正的主导权必须首先是一个策略,一个通过各种形式的手段如公民社会,学校和家庭,来赢得群众积极认同和产生一个集体的政治意愿的策略。

葛兰西主导性理论对资产阶级民主的分析中指出,相较之下资产阶级民主被视为有强大生命力和特别持久性,因为它承认政治制度和机制的重要性。按照霍布斯鲍姆的解释,这就是政治互动成为加强资产阶级主导权的一种有力手段的原因。一些口号如“保卫共和国”,“保卫民主”或者“保卫人权和自由”,都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联系在了一起,这毫无疑问首先有利于统治者,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与被统治者无关,因而,它们远高明于政治高压的粉饰,甚至更高明于简单的政治操弄。^{[12] (P.32)}

根据这个观点,革命后社会主义社会集中太多精力去建立一种经济体系和生产方式的转变,而没有付出足够的努力去加强和完善现实的政治制度和法制体系。社会主义社会对政治体制的忽视或不够重视与强调政治制度和民主妥协的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经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基于对上述讨论内容的理解,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相比,社会主义社会的弱点在于政治领域。换句话说,社会主义在政治领域的局限性阻止了社会变革问题的解决和主导权的建立。

(三) 当代社会主义局限性的几个方面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阵营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逐渐变成了只有专政而没有主导,即国家为阶级所取代。它创设了管理、官僚、法律强制的高压机构,直接的高压政治取代了主导权的手段。就群众参与政治和经济活动来说,毛泽东主席确实意识到了基层民主的重要性,通过群众动员,他激烈地攻击他所看到的官僚阶级现象。但是,这种认识并没有被制度化:民主集中制变成了官僚集中制(有机的集中制);群众运动偶尔被动员起来以监控政治官僚;权力被高度集中在党-国家机构手中,这些机构直接控制生产方式,垄断政治和经济

的决策;官僚社会主义将阶级关系变成了“家长式的关系”,即官僚阶级声称是掌握“科学知识”的积极的领导阶层,而大众却是消极的而且是不得不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方面依靠干部的一种关系。^{[13] (P.11)}

葛兰西不同意马克思列宁主义针对国家作用的概念和理解,因为它是一种阶级简化论并且将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复杂性降级为阶级关系。^{[2] (P.67)}根据葛兰西的观点,国家是实践和理论活动的综合体,通过这些综合活动,统治阶级不仅证明和维持它的统治,而且尽力去赢得它所统治的人民的积极认同。^{[5] (P.238-244)}这里,国家没有被描述为“工具”“器械”或“机器”,而是被描述为统治阶级活动的全部。尽管在任何类型的社会,统治阶级是通过国家来实现统一和权力的,但国家不能被简单用作统治的工具,将统治阶级自己的利益强加于其它社会集团和阶级。

公民社会是相对于政治社会而言的,政治社会指的是国家机器,如军队、政治、警察、法律强制和监狱以及各种政府部门。一个国家可以理解为是由政治社会和公民社会组成的。政治社会(国家)是强制统治的主要手段,而公民社会是认同力量的主要来源。因此,对于葛兰西来说,一个真正主导性国家是政治社会(强制)和公民社会(认同)的结合。

葛兰西非常重视公民社会。他把资产阶级议会民主视为资产阶级主导权的一种形式,这种议会民主是以公民社会的全面发展为基础的。^{[14] (P.47)}这是因为,公民社会是劳资和其它群体进行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和争夺的领域,也是政党、工会、宗教团体和各种其它组织形成的领域。它不但是阶级斗争的领域,而且是所有的大众进行民主斗争的领域,人们在这些斗争中通过不同的方式组织在一起,如性别、种族、年龄、地方、宗教、民族等等。^{[2] (P.69)}

统治阶级的主导性必须在公民社会中找到它的根基,这正是最终确认政治社会的合法性的基础。葛兰西的“权力”概念是一个关系概念。作为社会关系其一的公民社会也是一种权力关系。在这个意义上,政治社会可以被看作有形的权力,而公民社会则是无形的权力。在这个意义上,他以一种批

判的方式在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和俄国之间做了一个比较：在俄国，国家就是一切，公民社会是原始的；在西方，国家和公民社会之间有一个正确的关系，国家一旦动摇，一个强大的公民社会的稳定体系立刻显现。国家仅是外面的一道壕沟，它的后面矗立着一个强有力的堡垒和工事的体系。^{[5] (P.238-244)}

这样的比较也适用于解读中国社会主义的经历。中国是传统的以国家为中心的等级社会结构，由于封建社会历史长且发达，资本主义发展历史较短，历史没有赋予中国社会一个由多制度和多样化的社会关系组成的社会结构，也没有赋予任何层面上的民主传统。一方面，这有利于中国革命的“群众路线”，并通过大众革命迅速解决内部的和外部社会矛盾；另一方面，它成为革命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障碍，这不仅因为它缺乏马克思所强调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而且它还需要在所有的社会关系方面来强化无产阶级思想领域的主导意识。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不是在建设社会主义，而是在建设社会

主义的前提条件。

在研究西方资产阶级何以能够减少在工人阶级中爆发革命的原因时，哈门指出，西方统治阶级的力量主要不是依靠军事—警察机构的有形控制，而是依赖于意识形态的统治，这种统治是通过渗透于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各样自发性的组织机构来进行的（公民社会），如政党、工会、教会、大众媒体。强制性的国家机器只是资本主义社会众多的防御工事之一。^{[15] (P.16)}这也就是解释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西方资产阶级是通过国家机器、社会各层次上的“私有空间”的扩展和通过对敌对社会力量的中和来维持其主导性的。当代社会主义运动很明显在葛兰西所说的“战略要塞”方面失陷。

在这一点上，葛兰西给传统马克思主义增加了一个新的观点，即“整体国家”的主导性概念，也就是政治社会和公民社会的综合体。这个“整体国家”概念是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和经济决定论的补充。

[参考文献]

- [1] Roger Scruton. A Dictionary of Political Thought [M].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1996.
- [2] Simon Roger. Gramsci's Political Thought [M].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82.
- [3] Tom Bottomore. A Dictionary of Marxist Thought [M]. England: Basil Blackwell Publisher limited, 1983.
- [4] Im, Hyug Baeg. Hegemony and Counter-hegemony in Gramsci [J]. Asian Perspective Spring-Summer(Vol. 15), 1991(1).
- [5] Gramsci-Antonio, Quintin-Hoare, Geoffrey-Nowell-Smith.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M].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 1971.
- [6] Robert W.Cox. Gramsci, Hegemon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 Essay in Method [M]. in Stephen Gill, Gramsci,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 [7] James Martin. Hegemony and the crisis of legitimacy in Gramsci[J]. History of the Human Sciences(Vol. 10), 1997(1).
- [8] Rober J. Ross & Kent C. Trachte. Global Capitalism: the New Leviathan[M].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1990.
- [9] Marc J. Blecher. China's Struggle for a New Hegemony [J]. Socialist Review (Vol. 19), 1989(2).
- [10] Eric J. Hobsbawm. A New Science of Politics[C]. in Anne Showstack Sassoon (ed.). Approaches to Gramsci[M]. London: Writers and Readers Publishing Cooperative Society Ltd, 1982.
- [11] Anne Showstack Sassoon. Gramsci's Politics [M]. London: An Imprint of Century Hutchinson Ltd : xv, 1987.
- [12] Christine Buci-Gluksmann, Hegemony and Consent: a Political Strategy[C].in Anne Showstack Sassoon (ed.).Approaches to Gramsci[M].London: Writers and Readers Publishing Cooperative Society Ltd, 1982.

[13] Cliff Durand. The Exhaustion of Developmental Socialism: Lessons from China [J]. Monthly Review, 1990(12).

[14] Giuseppe Vacca. Intellectuals and the Marxist Theory of the State[C]. in Anne Showstack Sassoon (ed.),

Approaches to Gramsci[M]. London: Writers and Readers Publishing Cooperative Society Ltd, 1982.

[15] Chris Harman, Gramsci versus Reformism [M]. London: The Socialist Workers Party, 1983.

(责任编辑 匡四)

· 学术信息 ·

《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中卷)出版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张文木的《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中卷)于2010年9月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共三卷,目前已经出版了上卷和中卷。该书试图通过对三大地缘政治中心大国运用国家力量的极限和底线的经验性研究和总结,给准确认识中国国家力量的存量和变量从而制定合乎历史规律和实际能力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提供“资治通鉴”的准备。书中将当代世界地缘政治体系构成的基本特征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就是印度洋及其北岸地区,“两个基本点”就是大西洋及其两岸地区与太平洋及其两岸地区。古今大国全球争霸的历史逻辑是“两翼(太平洋、大西洋)包抄,中心(中亚、印度洋)突破”。上卷研究的是世界地缘政治三大支点的特征和差异,以及基于这种差异的世界主要国家力量彼此可达到的极限和底线,中卷则是对世界地缘政治中心区域大国博弈的历史经验以及其中大国运用国家战略能力的极限和底线的经验性研究和总结。中卷从俄罗斯写到印度和印度洋,内容分三个方面:1)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特征;沙俄帝国和苏联的兴亡经验及其中反映出来的俄罗斯介入尤其是强力介入世界事务力量的极限与底线。在篇幅分配上,这部分是全书的重心。2)印度洋地区的地缘政治特征及此间的大国博弈规律。3)国家崛起的非线性规律,即世界性危机也是大国崛起的契机。作者还就北极解冻的气候变化提出预警,认为它将使俄罗斯在历史上破天荒地不得不面临来自“四面八方”的安全压力并因此大大改变俄罗斯原有的无“北顾之忧”的国防结构——这与曾为中国安全提供绝对保障的东海在被拥有蒸汽动力和远航技术的西方人征服后所引起的中国安全“后院起火”及中国海军由此出现的情形非常相似,这将给中俄战略合作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同上卷一样,中卷只用不多的篇幅论述“中国国家安全观的拓展及其世界意义”,而用大量的篇幅做史料收集和历史经验的总结研究,这与作者的研究方法——“我的研究方法多不源自国际流行的理论,而是依据被人们称之为‘常识’的经验事实”是相吻合的。作者特别提醒读者“不仅要注意本书的观点,而且要注意能证明本书观点形成的根据及其来源”,因此上、中两卷是为下卷“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研究“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的前期‘资源普查’和国家安全能力‘化石’标本的收集、鉴别、比较工作”,是从世界政治历史范围内找出的支持下卷结论的“最硬的证据”。

(卷平冈)